



BEIDA OUME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

彭克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11·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

彭克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彭克巽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8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11)

ISBN 7-301-10651-3

I. 陀… II. 彭…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小说—文学研究 IV. 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805 号

书 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

著作责任者: 彭克巽 著

责任编辑: 袁玉敏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651-3/I·080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6.75 印张 46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清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

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研究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感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陀氏小说研究的回顾	(1)
第二章	“诗的激情也是哲学的激情” ——早期的文学探索	(28)
第三章	“通过分析个个原子,探寻整体”: 彼得堡的梦与现实	(43)
第四章	“留有一颗心……同样可以去爱”: 西伯利亚的囚徒	(67)
第五章	艺术帮助人对“他的理想……的寻求”: 重返彼得堡	(83)
第六章	从西欧之行到“地下室的悲剧因素”的探讨	(105)
第七章	“小说是诗意的事业”:《罪与罚》	(136)
第八章	“描绘正面美好的人物”:《白痴》	(184)
第九章	“思想的新颖和手法的独创性”:《群魔》	(233)
第十章	注视“流动着的现实”:1873年《作家日记》	(285)
第十一章	“地下室的诗人”:《少年》	(306)
第十二章	1876—1877年《作家日记》	(344)
第十三章	“魔鬼和上帝在斗争”:《卡拉马佐夫兄弟》(上)	(384)
第十四章	“发现人身上的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	(451)

第十五章 “俄罗斯的美的艺术典型”:关于普希金的演说……	(512)
基本文献……	(525)
主要参考书……	(526)
后 记……	(527)

第一章 序论：陀氏小说研究的回顾

一个半世纪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小说创作在俄罗斯以及世界的文学界、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现代文学和哲学流派不断关注和研讨的文化现象。陀氏作品激荡了广大读者的心灵，使他们浸沉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之中。许多文学家、批评家和思想家都发表过对陀氏创作的精辟、独到的见解，观点多样，拓宽了文艺学、小说美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哲学等人文学科的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下面，我们以小说艺术问题为中心对这些批评成果做一个简要的述评。

1846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登上俄罗斯文坛，受到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1811—1848）的热情称赞：“荣誉与名声属于年轻的诗人，他的缪斯是喜爱阁楼和地下室的人们的。”在《彼得堡文集》（1846）等论文中，别林斯基在论述普希金（1799—1837）、果戈理（1809—1852）和莱蒙托夫（1814—1841）的艺术才华之后，指出陀氏的才华“不是讽刺性的，不是描述性的，而是高度创造性的，并且其才华占优势的特征是幽默”；陀氏“并不以经验和观察所给予的那些生活和人的心灵的知识使人惊奇”；他是深刻了解这些知识的，然而“是纯粹诗意地、创造性地了解”，“他的知识是才华，灵感”。别林斯基的意思是：陀氏的才华不在于直接表现自己所理解的关于生活和人的心灵的知识，而是对此进行诗意而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别林斯基还指出，从《穷人》看来，陀氏才华的独特性在于“深刻人道和动人心弦的要素，汇合于幽默的要素之中”，以及“深刻地渗透于整部小说的悲剧性要素”。别林斯基的评论极为深刻而细致，他认为“更为令人惊奇的”是陀氏作品的这种悲剧性要素“不仅是用话语，而且也是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观念传达给读者的”。马卡尔是《穷人》的主人公。陀氏作品的悲剧性渗透于主人公的观念

之中,引起读者更为强烈的同情。实际上,别林斯基已指出,陀氏创作的特色在于深入主人公的观念世界。其次,别林斯基感受到这种悲剧性是同幽默糅合在一起的:“在同一时间里既逗读者发笑,又震撼他的灵魂,迫使他透过眼泪而发笑,这是多么有本事,多么有才华啊!”这位批评家进而提出,“像《穷人》这样的作品,谁也不能读第一遍就掌握;这样的作品不仅需要阅读,而且也需要研究”。第三,别林斯基看到强有力的想象力是陀氏创作的重要特征。批评家说:“想象力如此无穷尽之丰富,就是在规模巨大的天才们当中也不是经常能遇到的,想必,这种丰富性使《穷人》和《同貌人》的作者受折磨,感到苦恼。”我们在往后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陀氏对此有过亲身感受,证实别林斯基这一评论的精辟。别林斯基一方面肯定陀氏第二部中篇小说《同貌人》具有“极为深刻、果敢和真正的概念”,“作者显露出巨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认为作者在艺术上展开自己的构思时未能确立“合理的尺度和界线”,特别是作品的“幻想性色彩”很不合时宜。这是由于别林斯基认为当时俄罗斯所需要的是高度忠实于现实的文学,而对作品的“幻想性色彩”持批评态度,同时,这也是因为陀氏这时的“幻想性艺术”还不够成熟。^①

1847年,年轻批评家瓦列里安·迈科夫(1823—1849)发表《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指出:“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主要是心理诗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那里也可以遇到对社会的惊人的艺术描写,但它们在他那里构成图画背景,并大部分以如此精细的细线条显现出来,以致完全为巨大的心理学兴趣所吞没。”^②瓦·迈科夫的评论开创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陀氏作品的方向。陀氏同这位年轻批评家成为亲密朋友,在1861年的艺术论文中称瓦·迈科夫具有“光辉的信念”和“美好的性格”。^③

经受西伯利亚徒刑和流放的10年苦难后,陀氏于1859年底重

①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2—35页。

② 《迈科夫文学批评集》,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2—1990年,第18卷,第70页。

返彼得堡文坛。年轻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发表了论文《备受折磨的人们》(1861),指出陀氏的新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迄今为止本年度最卓越的文学现象”,并回顾和分析了陀氏从早期以来的创作。杜勃罗留波夫说:陀氏“以喜欢描写心理细微处而闻名”,侧重描写了“许多病态的、反常的现象”;陀氏“以其年轻才华的全部精力和新鲜性着手分析使他震惊的我们可怜的现实的畸形现象,并在这种分析中善于表达自己高度人道的理想”。杜勃罗留波夫看到:对备受折磨和被扭曲的人们的“疼惜”是作家陀氏的天性,而其艺术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些人们心灵深处“对人的本性的生动的、从来没有被磨灭的企求和渴望”。^① 杜勃罗留波夫的社会学批评将陀氏病态、畸形的心理描写同专制俄罗斯“可怜的现实的畸形现象”联系起来,指出了畸形心理产生的社会背景,同时深刻地看到对完满的人性的追求是陀氏的理想。

“有机批评”的批评家、诗人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在《我们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1861)中指出:作为理想主义者一诗人的果戈理在“含泪的笑”中为崩溃的“美好的人”而悲伤;他未能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话语;这个话语在他有生之年“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感伤主义自然主义的悲伤且强有力的呻吟声中响起”;或许,只是到了现在,在这位具有高度才华的作者的新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中,“这个病态而紧张的呻吟声才转换为明智而具有深厚同情心的话语”。^② 格里戈里耶夫的“有机批评”理论提出:批评应当深刻理解在艺术创作中表达着“生活的活生生的声音”以及“心灵世界和民众机体的伟大秘密”。^③ 他独特地提出了陀氏的话语同果戈理含泪的笑的关系。格里戈里耶夫在《涅克拉索夫的诗篇》(1862)中提到:陀氏“已经如此地把握到受苦难的心理学过程,以致在《死屋》中

①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42—65页。

② 阿·格里戈里耶夫:《艺术与道德伦理》,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86年,第283页。

③ 同上书,第68页。

完全同民众汇合在一起”。^① 格里戈里耶夫与陀氏一样具有“土壤派”观点,也是陀氏《时间》杂志的同人,他所提出的“感伤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受苦难的心理学过程”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死屋手记》(1860—1862)发表后,在俄罗斯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1862年第4期的《现代人》杂志评论说,这部作品“为理智和感情提供许多滋养”,是“对整个我们时代的最好的判决”;同一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征得陀氏的同意,准备编辑出版该手记的简写本。^②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在1862年2月给阿·阿·托尔斯泰的信中,向他推荐《死屋手记》。多年后,托翁在1880年9月给文学家斯特拉霍夫(1828—1896)的信中又说:“前些日子感到身体不适,于是我阅读了《死屋》。我忘了许多,重新读了一遍,结果我指不出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我们整个新文学中有比它更好的书。不是音调,而是观点令人惊叹,它是真诚的、自然的和基督教的。很好的、有教益的一本书。昨天,我欣赏了一整天,好久没有这样欣赏过了。如果您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说我喜欢他。”^③ 屠格涅夫(1818—1883)在1861年12月给陀氏的信中也称赞《死屋手记》说:“澡堂画面简直是但丁式的,而您对各种不同人物(例如,彼得洛夫)的性格刻画中有着许多细腻、真实的心理学。”^④

陀氏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开始了对“地下室”主人公虚无主义和“唯意愿论”的批判,但这部后来很受重视的作品在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陀氏女友苏斯洛娃(1839—1918)甚至认为它是“描写丑闻的中篇小说”、“犬儒主义的东西”。^⑤ 不过,斯特拉霍夫在1867年评论陀氏文集的文章中已看得比较深刻,指出《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反映了“在保持清晰的理智和意识时道德腐化和心灵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圣彼得堡,科学院规划出版社,1993—1995年,第1卷,第371—372页。

② 同上书,第360、362页。

③ 《托尔斯泰二十二卷集》,第17—18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76页。

④ 《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12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30页。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1卷,第457页。

脆弱的极限”。^① 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无疑是陀氏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以其深刻细致的心理分析和非凡的叙述笔法赢得当时许多报刊的好评。1869年2月,在完成名篇《白痴》后,陀氏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我有自己独特的对(艺术中)现实性的看法,那些多数人称为几乎幻想和例外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恰恰构成现实的本质。”^②后来,陀氏还直接用“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③来概括自己的这种艺术风格。陀氏小说紧密反映俄罗斯“流动着的现实”,尤其是“流动着的”思潮,因此经常受到不同思想阵营相互对立的评价。描写个人恐怖活动的小说《群魔》(1871—1872)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些评论认为它背离了文学的进步传统,写的是“不值得俄国公众注意的奇事”,另一些评论指出陀氏是“巨大的文学天才”,“不论他写什么,都出自其真诚而深刻的信念”。^④ 陀氏不断地加深对虚无主义和“庸俗无神论”的批判,探讨以基督的美德为榜样拯救世界(即“美拯救世界”)的可能性。《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正在连载发表时就已引起许多读者强烈的反响。1880年2月,艺术科学院院长费·托尔斯泰的夫人来拜访陀氏,看到他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为了鼓舞他,夫人拿出她在基辅的女儿,画家叶卡捷琳娜·云格(1843—1913)写给她的信,由安娜夫人读给陀氏听。这封信是谈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感想的,信中说:她热泪盈眶地读了这部小说,久久不能平静;她觉得陀氏是“那么细致而深刻的观察者,这只能使人惊讶”,“能够在世上找到同时拥有如此极端的现实主义,又是这样的诗人和理想主义者吗?!”“这几乎达到了艺术的理想”,陀氏是“现实主义者,精细的研究者,心理学家,理想主义者和哲学家”。^⑤ 陀氏说:这部小说,“还没有人这么深入理解地阅读过”。^⑥

陀氏逝世前不久在笔记本上留下两段著名的话。第一段是:“在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93页。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25卷,第91页。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338、305—306页。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300页。

⑥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84页。

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发现人身上的人。这首先是俄罗斯的特征,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是民众的(因为我的倾向来自民众的基督教精神深处),——虽然我还不为现今俄罗斯民众所熟悉,但将闻名于将来的民众。”第二段是:“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处。”^①这些话对于理解陀氏一生的审美活动很有意义。此外,这笔记本上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卡拉马佐夫兄弟》。坏蛋戏弄我对上帝有缺乏教养的和反动的信仰。这些傻瓜连做梦也想不到在宗教大法官和此前的章节中那种否定上帝的力量,而整部小说是对宗教大法官的答复。我不是像傻子、狂热信仰者那样相信上帝的。”^②

陀氏于1881年俄旧历1月28日逝世(注:凡是1918年前俄罗斯的事情,均用俄旧历;用公历时,另加标明),1月30日,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在追思陀氏的演说中说:“俄罗斯社会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或作家,而是自己的精神领袖”,陀氏经受了苦难,但他认为“要同粗暴的力量斗争不应当用同样粗暴的力量,而要用无限的爱的力量”;他呼唤在这种拥抱一切的爱中“人们和社会的精神复兴”,以便“在大地上实现全宇宙的真理王国”。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说》(1881—1883)中,弗·索洛维约夫进一步指出:陀氏小说的客体不是已固定、具有明晰形式的社会生活,而是“社会运动”;陀氏洞察到“整个运动的崇高、深远的目标”,公正地谴责了“不正确的道路和不好的手段”;陀氏的理想与基督教信仰和基督的理想相联系,同时陀氏“又是完全自由的思想家和强有力的艺术家”。“他在自己的信念中从来没有把真理与善和美隔开;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从来没有把美与善和真理分开提出。”“美同样是善,同样是真理,实体地体现在活生生的具体的形式中”,因此陀氏才说出“美可以拯救世界”。^③弗·索洛维约夫实际上进一步发挥了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7卷,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

③ 《思想巨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思想巨人》),圣彼得堡,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9—49页。

陀氏宗教乌托邦的思想,对“真善美”的关系做了理想主义的哲理阐述,开了俄罗斯“白银时代”陀氏批评的先河。

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的论文《残酷的天才》(1882)反驳弗·索洛维约夫关于陀氏是社会的“精神领袖”的说法,指出陀氏临终前几年把自己描绘为“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民众因素的”、正教俄罗斯国家官方力量的“某种支柱”;陀氏只是值得仔细研究的“具有独创性的大作家”,然而“残酷性和折磨行为总是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而且正是从它们的吸引力方面,从在折磨行为中似乎存在的快感方面引起他的兴趣”;他喜欢挖掘吞噬羊的狼的“心灵深处”,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暴君,喜欢折磨人”。^①米哈伊洛夫斯基忽略了强烈批判暴君和虐待狂正是陀氏小说诗学的激情所在,从而带有片面性。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残酷的天才”的提法,影响到后来庸俗社会学的陀氏批评。不过,这位民粹派批评家也触及到陀氏思想中的矛盾,例如提出陀氏渲染俄罗斯人“喜欢受苦难”等。

在陀氏生前,西欧文学界对陀氏也多少有些了解。例如,1867年6月德国的《外国文学杂志》曾刊登评论陀氏创作,特别是《罪与罚》的文章;1879年6月,以雨果为名誉主席的国际文学学会选举陀氏为名誉会员。^②但是,据苏联科学院的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959)的介绍,西欧真正认识陀氏是在80年代中期。例如,在法国,陀氏主要作品的法文译本在1884—1888年间相继出版,如1884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罪与罚》,1886年《死屋手记》和《群魔》,1887年《白痴》,1888年《穷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

法兰西学院的研究者、外交官伏居耶(1848—1910)在1886年发表了《俄罗斯小说》一书,对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氏和托翁这五位作家作了评介。在《忍耐的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章中,伏居耶指出:“只要看一看《罪与罚》中马尔梅拉多夫的故事,囚徒们的肖像及其生活图画,就能明白没有人把现实主义推到更前面;只要看一看《白痴》中的所有人物,就会明白没有人敢这样涉猎于幻想领域。”

①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06—341页。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118页;第3卷,第327页。

伏居耶认为陀氏“真实而冷酷地描绘了生活的现实”，以超人的毅力寻求对福音书的某种新理解，他的创作可以称为“神秘主义的现实主义”。伏居耶说：人们可以称陀氏为哲学家，圣者使徒，苦恼的安慰者等等，但每一单独称呼都是不充分的；陀氏具有双重性格，那就是“慈善修女的心和宗教大法官的精神”；他是“游历整个世界并卓越地描述了所看到的一切的旅行者”，但他是一个“暗夜”旅行者，因此他“只写过两种书：苦难的书和恐怖的书”。伏居耶曾在俄国居住过五年，1880年1月与陀氏有过一次交谈，也亲眼看到陀氏在当时的俄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在评论陀氏章节的靠近结尾处说：“屠格涅夫的文学艺术权威不公平地被遮盖；托尔斯泰的哲学只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抓住了人心，他的方向在现代运动中的作用恐怕是最为强烈的。”^①伏居耶的陀氏评论，作为西欧较早的反响而耐人寻味。

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在1887年第一次读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作品的法译本时，非常激动。他在2月23日给友人欧佛贝克的信中说：“几星期前，我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是不读《新闻杂志》的无教养的人！偶然在某家书店翻书时，刚刚翻译成法文的《地下的精神》映入我的眼帘。(21岁时遭遇叔本华，35岁时发现斯丹达尔，也都是完全偶然的！)血缘的本能(或者应当怎么说呢？)立即向我呼唤，我的心欢乐地跳动起来。如果要回想同样的喜悦，我就不得不回溯到认识斯丹达尔《红与黑》的时候。”^②3月7日，尼采又给他的助手、青年音乐家盖斯特写信说：他虽然还不熟悉陀氏的地位、评价和生平，但认为西伯利亚徒刑的四年是“重要时期”；陀氏“发现了心理学上的直观力。不仅如此，此时他的心和缓起来，深化了”；而《死屋手记》是“现有的最富于人性的著作之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使他“怀有对艺术家陀思妥耶夫

^① 《俄罗斯小说》，巴黎，普隆出版社，1927年，第267—272页。

^② 《尼采全集》，东京，理想社，1980年，第16卷，第72页。本卷译者塚越敏、下村铁男。注：《地下的精神》指《地下室手记》。

斯基极大的敬意”。^①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1888)一书中进一步谈到：在当时他们那“驯良、中庸、阉割过的社会”当中，那些来自山岳或海洋冒险的自然怀抱的人不可避免或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罪犯，因为他们被证明为比那社会更强有力。尼采接着说，“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最著名的例子。对这里所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具有重要意义”，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当中，发现这些囚犯“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尼采在此还谈到陀氏是他从那里学到一些东西的“唯一一位心理学家”。^② 尼采的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于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其代表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写于1883—1885年间，提出了“上帝已经死亡”、“因此现在我们的愿望便是超人的生存”这一命题。由此看来，不能说陀氏思想影响了尼采哲学，况且这两位思想巨人的观点有尖锐对立的一面。依据俄罗斯著名学者弗里德连杰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一书中的研究^③，陀氏在《罪与罚》、《群魔》等作品中对“超人”心理的淋漓尽致的描绘，为尼采提供了重要例证。但是，陀氏是批判“超人”思潮的，并将希望寄托于基督美德的实践者。因此，法国神学家亨利·德·吕巴克在其著作《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45)中称陀氏和尼采为“互相对立的两兄弟”。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罗斯的陀氏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和宗教思想家瓦·罗扎诺夫(1856—1919)在其著作《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1891)中指出：“与托尔斯泰伯爵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精神中尚未定型的东西的分析家”；“他所塑造的人物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主要的东西是思考，而不是直观”，他所展示的是“人的良心深处”，“人的非理性的本性的集中点”；陀氏具有一系列宗教思想，“他由怀疑过渡到信仰，再由信仰回到怀疑，只是在否定中是坚定的，在肯定中他是动

① 《尼采全集》，第16卷，第77—78页。

② 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88—89页。

③ 参看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34—246页。

摇的”；陀氏小说是“心理分析、哲学思想和宗教倾向与怀疑的斗争的综合”。^①在这部著作中，罗扎诺夫对陀氏的小说艺术和宗教思想分析得比较客观，但是对果戈理艺术的评价过低。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堂上》（1909）一文中，罗扎诺夫进一步指出：陀氏是“我们，或许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辩证法作家的范例”，使读者难于单纯地回答他笔下的某个人物仅仅是个罪犯、妓女、酒鬼等等，例如，“酗酒有什么正面的东西”？然而陀氏却通过《罪与罚》中马尔梅拉多夫的故事迫使许多人“倾听醉鬼的忏悔，倾听，惊诧，为这忏悔而哭泣”；“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他的辩证法，不是像柏拉图和黑格尔那样在逻辑中，在公式中，而是在艺术上，并且通过它，将丑和美混合在一起”；陀氏极大地扩充了福音书的意义，艺术地阐明了其“宽恕”的思想。^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使我们感到宝贵？》（1911）的纪念文中，罗扎诺夫独特地指出：他与几乎所有读者相反，在一生中都没有从陀氏那里感受到“病态的印象”、所谓“病理学的、刺激神经的”东西；陀氏是“最真挚的、最内心的作家，以至于读他的作品时，觉得似乎不是在读某个他人的作品，而是在倾听自己的灵魂，只不过比平常更为深刻地倾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奇迹在于拆除主体（读者）和客体（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而，他成为“最令人亲近的作家”。陀氏的思想可能过时，显得虚幻，不被赞同，但他的“精神权威一点也不会减弱”。陀氏一生所表达的“不是科学，不是诗歌，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至少不单纯是它，而只不过是人本身的新感情，再次被揭示的人的听觉和视觉，而不是心灵的听觉和视觉”。^③罗扎诺夫站在很宽阔的人文立场评论陀氏，对其艺术特征有精辟的表述；看来，他是陀氏的崇拜者，又是随笔作家，有些赞语显得过分。

象征主义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对陀氏小说艺术也有不少独到的论述。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93）一文中指出：

① 罗扎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1—52页。

② 《思想巨人》，第261—265页。

③ 同上书，第272—276页。